

D u z h e s h i d a i

读者时代

一本杂志和她所影响的生活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师永刚



# 一本杂志和她所影响的生活

师永刚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者时代:一本杂志和她所影响的生活/师永刚著.  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

ISBN 7-208-03708-6

I.读... II.师... III.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  
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1800 号

责任编辑 陈 军

装帧设计 袁银昌 李 静

### 读者时代

——一本杂志和她所影响的生活

师永刚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3 字数 322,000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0,000

ISBN 7-208-03708-6/G·720

定价 25.00 元

杂志有生以来便代表一种智慧的活动。杂志的作用,是从旧材料中编织新的故事,配合时代的潮流改写历史及传记,伸张已经被人遗忘的真理。使健康的知识更能适合人的口味,化玄奥的科学为应用的知识,向世界上黑暗的角落,以及人类文化教育的若干隐处,投以搜寻的光亮,发起新的运动导引旧的运动,高掀警铃,使酣睡中的人们自梦中惊醒,扭转那些向后张望的头颅,使它目向前方……

摘自美国《独立周刊》1904年10月1日社论

贾

平

四

# 一 杂 志 传

世上有为某一人物作传的书，也有为某一事件作传的书，但为一本杂志所作的传记却是罕见的。当师永刚先生将厚厚的一叠书稿寄来嘱写几句话时，我着实是吃了一惊，遂之欣然命笔。我说，二十一年里有《读者》是时代的一桩幸事，完成了《读者时代》又是读者的一桩幸事了。

我是《读者》的读者，从创刊到今日，热爱不减。我本人也是从事编辑工作的，甚至创办和主持过一份报纸和一份杂志，我深知当编辑的辛苦，深知让一本杂志产生影响和继续扩大影响是多么地不容易。作为一本文学杂志，又是出现在中国西北的边城，见证和参与了一个时代，影响了广大人群的生活，《读者》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。《读者》的成功，作为同是办刊物的我们那一帮人，尤其是我，研究过，借鉴过，而最后感叹了，无奈了，自愧不如。

师永刚是有心计的，它记录和评述着《读者》，何尝不是记录和评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呢？这样的书，一般说来是容易枯燥的，但《读者时代》激情淋漓，笔法灵动，翔实的记录中充满了诗质。如果是这么一本有情有致的书，已经够我们享受阅读的欢乐了，但作者仍要透过种种现象分析提示许多社会问题，理顺更多的文化心态，诗



Z a z h i   Z h u a n

人原来是哲人,这又是我们不得不庄重,变得智慧起来。

感谢上苍,日子虽然难过,过着却也充实。

二〇〇一·四·四

余

秋

雨

## 三十五年的开头与结尾

刚刚从欧洲考察了近百座城市回来，满脑子山重水叠，不想动笔，连沿途写的一些札记也仍然塞在旅行箱里没去整理。突然有一位以前不认识的青年作者要我为他的新著写一篇序言，这样的事我近年来已经不做了，正待婉言谢绝，耳边又传来半句，他说那书专写甘肃的那本杂志《读者》……

“你写《读者》？”我追问了一声，便立即答应了。

怎么偏偏在我结束旅程的时候又是它呢？这位叫师永刚的青年作者究竟是谁派来的呢？

十五年前，在我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也曾遇到过它。

那时我正经历着一场思维危机，突然对一整套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，随之也对自己已出版的几部史论著作不满意起来。我决心重新开启感觉系统，去感受文化的真实体温，而不再仅仅作观念和史料的拼接游戏。于是，不带一本书来到青海和甘肃，直接去面对黄土高原的沙谷焦岩、废城枯河。这些伟大而悲怆的伤痕疤，全然无法在书斋中想象。但是，一次次惊悚终于积累成了迷失，历史变得那么狰狞繁复，个人变得那么孤独无助，我将如何来继续



计划中的旅行?至此才稍稍明白,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在辽阔的文化领域急忙筑起概念的栅栏、书本的围墙、集体的方阵?至少一半是为了躲避这种狰狞和孤独。我不想刚刚起步就撤回,因此在兰州城一处清冷简陋的角落里夜夜苦思,天天徘徊。

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在兰州的书摊上买到了这本杂志,当时还叫《读者文摘》。读完一本,再去搜寻以前各期,才知道它在当时就已经非常畅销。

按照往常的阅读习惯,我也许会觉得它过于清浅甜美,不够厚重辛辣。但是为什么,我一次次把它放下又一次次把它捡起?

它的大多数篇目,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;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羸杂质,因此可以一篇篇、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,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;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、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,而是平民百姓;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、诉苦者或抗击者,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;点燃者和被点燃者完全平等,不分界限,因此点燃和被点燃常常是同时发生的寻常行为……

这些特征现在看起来可能并不稀奇,但在当时中国的阅读领域却还颇为罕见。那是一个驱逐灾难、评判历史、谋求改革的时代,一切声音都响亮而决断,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头晕,而它则在遥远的角落温和地表明,社会改革的基座是广大普通人的心态和生态。这种主张使广大普通人有事可干了,不再只是抬头观望、企盼、抱怨,而可以低下头来在自身和周围发掘美好、营造和谐。在我看来,这也正是这本杂志能达到那么高的发行量的根本原因,它使原本在精神上无为的人群变得有为。



社会上当然还有大量比《读者》更深更高的课题需要一批专家静心研究,但我一直怀疑其中有一部分是打扮起来的架势,故意把简单的问题缠成了复杂。许多看起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用最简明的逻辑一看便洞若观火,大量盘旋曲折的恩怨是非只须稍稍比较一下人品细节就一清二楚。因此,《读者》式的视角有自己独特的力度。

在兰州的居所里我边翻阅这本杂志边想,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,我因摆脱了原先的书本而全然迷失,却也可能凭着寻常情理重新找到线索。以人性、人道、善良、美好为基本标尺,再坎坷狰狞的历史也可能被读解。于是,我有了继续旅行的信心。

更让我兴奋的是,我在这里又找到了一条摆脱孤独的道路。既然我今后要把持的是寻常情理,那么也就可能一路与很多普通读者谈心,《读者》所摘录的中外文章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范例。

于是,就在兰州旅舍的木桌上,我写下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“行走文学”的最初几篇文章。写完一篇就去找邮筒,寄给《收获》,随写随寄是为了不使写作堆积成负担。那时我已经明白行走是我的宿命,而吐露行走的感受则是一种愉快。只是感受,不是结论,而且是能够与普通读者交流的感受,这便是当年的《读者》给我的启发,尽管我后来在旅途中所遇到的考察对象是那么艰涩又那么庞大。

我行走的路程越来越长,原以为走一圈能找到一些答案,谁知更多地找到的却是问题,于是必须再走下一圈。一圈圈扩大开去,最后只能从中华文明走到其他早已衰落的人类古文明,以及另一支存活下来的文明即欧洲文明。这样的漫漫长途,当然再也读不到《读者》杂志,但每次回国都还与它有点关系,因为几乎每次回国都会遇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人生磨难。每当惊诧莫名、怒火中烧的时刻,总会有



一个温和的精神天地静静地出现在眼前,这倒未必专指《读者》,而是一种包括它在内的气质性、思路性存在,好像有很多声音,讨论着我的遭遇,善良而又智慧。至于讨论的结论,一切进入过这个天地的人都能推测。就在这许多遭遇中的一次正巧发生的时候,收到了《读者》编辑部写来的一封信,要我对他们的杂志作些评判,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拿起笔来写道:

从80年代到90年代,社会转型剧烈,人心激动而浮躁。居然有一群书生,日日夜夜收集着海内外点点滴滴的精神甘露,月复一月、日复一日地广洒九州,洒向时代、社会和人心的干裂处,其功其德,难以估量。

这件事发生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游的岸边,使人们重睹民族精神版图的早期平衡,不禁对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重新打量。这后半段话,表述了我对自己旅行出发地的一种特殊感受。

我这次旅行历时十五年,终点是北极圈。我站在冰天雪地中朝南长叹一声,终于走完了。从北极圈南下到赫尔辛基,然后在那里搭乘飞机回国,谁料那么快就遇到这个年轻作者,开口便是《读者》。

我立即答应写序言是因为大吃一惊,怎么十五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它!

师永刚为《读者》写传记很有意义,一本发行量如此大的杂志出现在社会转型的时代,其实已成为历史的缩影,不知负载过多少人生的冷暖。师永刚把编辑部作为主要采访对象,写出了这样一群创业者如何在艰难中不断作出有见识的选择,最终创造出中国最高发行量这个奇迹来的。我读下来的感受是,读者不可欺,创造一时的发行

量奇迹并不难，要长期创造则必然有深刻的人文原因。历届编辑人员忙忙碌碌，其实都在延续和修订着一种魅力长久的道义原则和美学原则。这本登上发行量峰巅的刊物历来很少作外部传扬，此中包含着一种令人深长思之的必然。

然而我们也都承认，这种成功又与特定时空中的读者群体有关。是读者和编辑人员一起，创造了“《读者》时代”。因此，这本传记如有续篇，应该仔细地写一写各类读者。我且先把自己作为读者的一个例证提供出来，不知这样的素材能不能算作序言？

二〇〇一年春

胡

亚

权

## 解读《读者》

办期刊是一种智慧的活动，大到纵横捭阖，小到细微末节；明处须直面公众，暗处应精心策划；朝前要展望未来，朝后要洞悉历史，缺乏智慧怎么能行？

办刊又是一种冒险。冒险的乐趣在于永无止境，每天都做着明天的事，面临数不清的问题和挑战，仅从大把问题堆里理出其至要者，并机敏地处理好，已属不易。列宁说过，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，要比十个聪明人提出的还要多。你首先得试着当傻瓜，然后再练就一身解决难题的本事。慢慢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：提出问题不算本事，解决问题才算本事，漂亮地解决问题那算是真本事。好在，经验是在痛苦中被记住的。我们摸爬滚打，已有二十余年，最有效的经验可称之为收获，收获以外的经验只能算作教训，而教训的价值是很卑微的，所以宁可把经验二字换成体验来说，更显得自然和贴切些。所谓经验往往是不可学的，要靠自己去创造；体验可以说是脚和鞋子的关系，只有自己知道合适不合适。

办刊也可算是一种游戏，一旦你制定了游戏的规则，你就得玩下去，输赢在所不惜。胜面大一些，表示你技艺还行，或曰运气颇好。但是切记，你不得随意改变规则，否则你将玩完。因为历史将忠

实地记下你的胜率和败绩，且毫不留情。

写到这里想到一位旅美华人画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，美是一种过程。很久以后我才琢磨出这句话的含意。我们所做的事，一旦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，有意义的，那么，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美。这种美包含了所耗费的神智，所经历的痛苦、辛劳、鲜为人知的所有不安和期盼，以及成功后的百感交集。这样，便产生了所谓的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历史只是过程的再现。

换言之，历史总归是过去，不可能是面对未来的灵丹妙药，所以我们仍在学习着，探索着，进取着，收获着，扬弃着，永无休止。

我接触过的作家、记者和朋友们，对我这类人常有一比。有人比作儒家，又说不像；好几个比作道家，有庄子倾向，也觉不妥。只有一位将我们比作堂吉诃德。我比较认同。因为我们的所有行动和作为，在许多人看来是不现实的，充其量只是一种善良的冒险。塞万提斯在400年前写这本书并塑造这位人物时，不知作何想，但我认为，那位中世纪骑士的思维方式之纯真善良和行为的执著与认真，是人类在欢笑之余可以无尽地去汲取的。妙就妙在，在那本巨著里，理想是现实的，而现实却是理想的。唐·吉诃德永远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。

《读者》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的过程，使我们想到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，合理的就是存在的。《读者》从存在的合理，到合理的存在，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路。《读者》在改革开放之初诞生，生逢其时。《读者》吸引千万读者认同，喜逢挚友。《读者》还以自己固有的气质成长着，性格鲜明。这三点，可视为《读者》取得成功的根本理由。

在一篇回顾《读者》的文章中，我曾这样说过：

编辑部从来没有把《读者》当作48页印刷纸去看待，而是把她当作一个活生生的“人”去培养。我们把《读者》人格化，努力使她有思想、有追求、有风骨、有情致、有志趣、有格调、有性格、有风韵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有自己的幸福家园，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。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。

作者曾有意把本书取名《公民〈读者〉》，并试图解读她，说明他赞同这一观点。公民《读者》有一些自己的见解。她主张多元文化的共存。在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线的前提下，又力图把中华文化置入世界文化的大构架中。她恪守了中国风格，同时对外来文化持包容和吸纳的态度，不妄自尊大。在多元文化中，《读者》还强调文化的综合性，设法在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人文、科普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，体现文化的文明本质以及它的地域性、民族性、互补性、交叉性、传承性和永恒性。《读者》还试图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打通一条管道，弥合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。

《读者》的精髓在哪里？

首先，《读者》是人性的。《读者》抓住人性这个主题不放，试图从多方面诠释之。在人性的大主题中，《读者》选择了真善美的人性追求，一以贯之地铺陈和展示，乐此不疲。她试图找到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，通过那些优美的故事、文字和图画，感染人们，轻轻触摸到各色人等心灵的最软处，使人们从中得到领悟、抚慰、联想、净化、认同、关爱、甚至援助的阅读乐趣。

其次，《读者》是理性的，她既入世而又出世，永远用一种思索的神态看待这个纷纭世界。她力求客观地表达发生在世界上的许多

事，但不去表露自己的观点和好恶。《读者》的内容编排长期没有大的变化，但思想却是十分活跃和冷静的，连那些好似信手拈来的小小补白，也须经过反复筛选，绝不随意。对于文摘类这种二次文献杂志，要做到这一点，除了技巧，更重要的是编辑的思想和责任心两种理念。

第三，《读者》是知性的。在她成长的每一步，都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的探索。她注视着世界的变化，和中国读者一道携起手来前进。试着保持一种与时代的同步，甚至微微的超前。她再现历史，是为了今天的进步；她表达现实，目的是面朝明天。张伯海先生说过，《读者》在提高读者的同时，也在提高自己。

第四，《读者》是平民性的。她只是一介平民，和老百姓一样生活和呼吸。她视读者为朋友，而不是所谓“上帝”；读者待她如知己，可诉说衷肠，亦能鼎力相助。《读者》服务读者的精神、回报读者的行动、高质低价的策略，都来之此种缘分。所以，《读者》对教育的支持、对环境保护的号召，都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认可和热烈响应，并取得了巨大成功。

简言之，《读者》体现了一种看似超然，实则亲近的人文关怀。作家李书磊评价《读者》时说，她的这种诗意的情调实际上代表着人生的正统。她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类自身存在的绝对认可。

《读者》的常盛不衰，一直受到媒体界关注，并把这种状态称之为“《读者》现象”。这种过誉，更使她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青年作家师永刚早有解读“《读者》现象”的冲动。他花了三个月时间作了认真采访，想了想，然后用他自己的视角，自己的观点，自己的感受，写成了这部书稿。他的一些过激的结论和放大的称赞，实不敢苟同，但我

可以向读者负责地说,事件和事实基本是准确的。

《读者》的历史好像是一个谜,这个谜今天已大致被揭开。《读者》的未来又是另一个谜,这个谜面正在制作着。将来的谜底,只能由读者帮她去揭开,但愿这个谜底是更美好的。

写于新世纪元旦之夜



一本杂志与她所创造的传奇

# 序章